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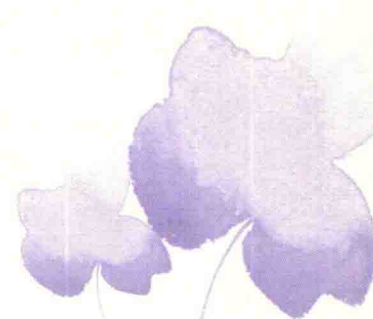
陈其泰 著

新历史学 视野

展现民族文化
非凡创造力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历史学新视野

——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

陈其泰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学新视野：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 / 陈其泰
著. —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7
ISBN 978-7-100-15392-8

I. ①历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史学史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K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3608号

权利保留，侵权必究。

历史学新视野——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

陈其泰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务印书馆发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-7-100-15392-8

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8 插页 4

定价：98.00元



作者简介

陈其泰，广东丰顺人，1939年出生。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山东大学兼职教授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主要著作有：《陈其泰史学萃编》（全9卷，即出）、《中国史学史·近代卷》、《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》、《历史学新视野——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》。主编《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》及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》，分获北京市第九届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、一等奖。发表论文、文章约300篇。

前言

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，而且各个历史时期各具特色，多姿多彩，构成波澜壮阔的文化长河，令每一个中国人为此感到无比自豪。而史学则是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的学问，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、历史传统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。在商代，我们的祖先就以“有册有典”来表明自己所达到的文明程度。到西周初年，便形成了具有深邃历史智慧的“殷鉴”观念，其价值鲜明地体现于西周王朝创立的文物制度的方方面面。也就在这一时期，产生了内容极其丰富、编纂体例高明的经典史籍《尚书》。此后，历代史家不断努力，撰成丰富多样的史著，构成了几千年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记载，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。仅载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的史部典籍，就多达15门类30199卷，数量之巨、门类之多，都令人惊叹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滋养了内涵丰富、形式多样的中国史学，而史学又以自己独特的思维、学科的特质、创造的活力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，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文化认同做出巨大的贡献。

琳琅满目的史学典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。尤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史学名著，它们的成就或是在客观史实记载上，或是在编纂体裁体例创新上，或是在历史学的理论思维上，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生动例证，亟须对此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总结。譬如，司马迁总结了先秦史学的成果，同时融会了西汉时期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，著成一部“通古

今之变”，丰富生动的内容与合理完美的形式高度统一的不朽杰作《史记》，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，不仅影响到历代纪传体、编年体、典制体等史著，而且影响到现当代的历史编纂。今天，我们把其中超越时空、具有永久魅力、具有当代价值的精华进行认真总结和大力发扬，就能为推进当今史学的发展、提高民族自信心、增强民族文化创造力提供宝贵的思想营养。因此，以新的视野研究“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”这一课题，不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然而这一总结和阐释工作又是十分艰巨的，本书只能选取若干重点问题做初步探讨。上编“传统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”，主要讨论三方面问题：一是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这两部历代传诵的名著所体现的杰出文化创造力；二是《国语》这部“准经典”著作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，以及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；三是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这两部史评名著的非凡建树。下编“时代新课题与学术新探索”，主要讨论两方面问题：一是晚清时期今文公羊学盛行、《射鹰楼诗话》、《日本国志》、《国闻报》与民族危机深重、探索救亡道路的密切关系；二是20世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巨大的“新史学”流派（梁启超、萧一山是主要代表人物）、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取向、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。

目 录

上编 传统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

第一章 《国语》的史学价值 / 3

第一节 《国语》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/ 3

第二节 “记言”史书的成功创设 / 23

第二章 司马迁著史的杰出创造力 / 43

第一节 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 / 43

第二节 世家：“应另换一副眼光读之” / 63

第三节 体圆用神：《史记》编纂体例、结构的匠心运用 / 79

第四节 “画龙点睛”：《史记》议论的运用 / 104

第五节 《史记》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/ 124

第三章 《汉书》：继《史记》而起的巨著 / 136

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名著 / 136

第二节 《汉书》对《史记》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 / 154

第三节 浓墨重彩：班固如何书写武帝时期历史 / 169

第四节 《汉书》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/ 181

第四章 《史通》：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 / 191

第一节 总结史书流变和编纂体例得失 / 191

第二节 刘知幾的理论批判精神 / 201

第五章 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/ 209

第一节 诠释“儒学理性精神”重新审视“乾嘉学术” / 209

第二节 乾嘉学术名家对儒学理性精神的发扬 / 216

第六章 章学诚的学术创造精神 / 226

第一节 开阔的学术视野 / 226

第二节 对历史哲学的探索 / 247

下编 时代新课题与学术新探索

第一章 晚清今文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/ 271

第一节 时代剧变呼唤倡导改制变革新学说 / 272

第二节 改造传播公羊学说 探求救亡革新之路 / 281

第二章 时代剧变与学术的新探索 / 290

第一节 《射鹰楼诗话》的诗史价值 / 290

第二节 《日本国志》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/ 302

第三节 《国闻报》与晚清新思想的传播 / 312

第三章 梁启超：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 / 329

第一节 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 / 329

第二节 梁启超的爱国情怀 / 341

第四章 萧一山与清史研究 / 345

第一节 抗战时期萧一山历史观的跃进 / 345

第二节 《清代通史》对传统史表的成功运用 / 357

第五章 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 / 366

第一节 新历史考证学兴起的学术文化条件 / 366

第二节 新历史考证学家治史的基本特征 / 370

第三节 用科学历史观的指导把新历史考证学推向新境界 / 375

第六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珍贵的思想遗产 / 384

第一节 “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” / 384

第二节 实事求是优良学风及其经受的严峻考验 / 405

主要参考文献 / 428

后 记 / 439

上 编

传统史学与民族文化创造力

第一章 《国语》的史学价值

第一节 《国语》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

一、被边缘化的古典名著

《国语》是一部先秦史学名著。它按照国别记载西周、春秋时期的历史，分为《周语》三卷、《鲁语》二卷、《齐语》一卷、《晋语》九卷、《郑语》一卷、《楚语》二卷、《吴语》一卷、《越语》二卷，共二十一卷。它所记载的历史范围，最早为周穆王伐犬戎之役，最晚为公元前473年（周元王三年）越灭吴。由于《国语》记载的历史时期与《左传》大致相同，所载历史事件又与《左传》密切相关，因此长时间内每有人称《左传》为“春秋内传”，而称《国语》为“春秋外传”。《国语》的撰著者，因司马迁有过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”^①的话，因而长期被归到左丘明的名下，甚或认为《国语》一书是左丘明撰成《左传》之后将剩下的材料纂辑而成。近代以来学者们经过反复探讨，证明上述说法并不可信。目前多数学者认为，《国语》是一部独立的史书，它的纂修者，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且年辈长于孔子的鲁君子左丘明，也不应与《左传》是同一作者。《国语》书中《晋语》卷数最多、叙述最详，次为《周语》，以此来推断，其纂修者应是出自战国时期三晋人之手。^②先秦时期有不少典籍的纂成过程有一共同的特点，即“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”，《国

① 《汉书》卷六十二《司马迁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② 沈长云《〈国语〉编撰考》一文说：“看来，只有晋国的后代——韩赵魏三晋之人编辑《国语》的可能性最大。”参见沈长云：《上古史探研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332页。

语》也是如此。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前期^①，但不排除后人有所附益增饰。

然则这样一部古典名著，长期以来却被边缘化对待。习见的情况，是它作为研究先秦历史的史料屡被引用。从研究层面说，已有成果主要关注于讨论《国语》一书的成书年代。^②而讨论其史学价值和编纂特色的文章，笔者所见到的，仅有白寿彝先生于50年前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《〈国语〉散论》一文。^③可以说《国语》是长时间被冷落了，这种情况与《国语》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。《国语》之所以被边缘化对待，恐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。一是被《左传》的成就所掩盖。两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，以往又长期被称为“春秋内外传”，因而造成一种思维定势，即以《左传》的优点来衡量《国语》。其结果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《国语》的不足之处，而忽视了其优长之所在，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“《国语》并非是一部史”。二是没有充分揭示《国语》何以称为“语”，这种史书体裁为何产生于战国初期，书中记载的“语”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和宝贵的价值，以及《国语》在历史编纂上有什么成就等。

如此情况，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任务，即必须努力探究《国语》本身的特色，对其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做恰当的评价。实际上，前人曾对《国语》做过很有见地的评论，其中以三国时代的韦昭 and 宋代学者戴仔所论尤为精辟。韦昭是著名的《国语解》的作者。《国语》一书历代很受重视，自汉代以后一

① 参见白寿彝：《白寿彝史学论集》（下）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855页。梁启超《要籍解诂及其读法》中则将“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之成书年代”一并讨论，云：“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皆述晋灭智伯事，《国语》述越灭吴事，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，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《春秋》约三十年矣。……故先辈或以《左传》为战国初期作品，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，吾颇信之。”（梁启超：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七十二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56—57页）夏经林则认为应成书于战国中期，他说：“《国语》的成书，应当晚于越王无疆的被杀之年；应当早于战国晚期成书的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诸书，早于秦攻破楚郢都之年，即当在战国中期，具体说是公元前329年—公元前278年之间。”（夏经林：《论〈国语〉的编纂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5年第4期）又，沈长云在《〈国语〉编撰考》一文中提出，《国语·晋语》（四）中有“唐叔之世，将如商数，今未半也”的话，预见晋国之亡，这已是公元前376年，即战国中期的事。又《鲁语》中提到的“三公六卿”，也属战国晚期人的构想。这些都是《国语》成书不可能早于战国晚期之证。此说也可参考。沈文中也说：“《国语》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。”据此，则与《国语》成书于战国初期，但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后人附益的部分之说，也并无大的矛盾。

② 除上引沈长云文外，还有李坤《〈国语〉的编撰》（《史学史研究》1988年第4期）、王树民《〈国语〉的作者和编者》（载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：《国语集解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）、夏经林《论〈国语〉的编纂》（《中国史研究》2005年第4期）。

③ 白寿彝：《〈国语〉散论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62年10月16日。

直完整地流传下来^①，东汉以后至魏晋，学者郑众、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昭、孔晁等都为之作注。唐宋之后，多家之注失传，而韦昭《国语解》独存。韦昭，诚为《国语》之功臣，他是三国时吴国史官，吴主孙皓时为侍中，领修国史。持正敢谏，为孙皓所杀。所著除《国语解》外，还有《吴书》二十五卷等。韦昭注《国语》，吸收了贾逵、唐固、虞翻等人成果，而又熟习春秋时期史事、人物、典制，精于训诂，他的注文，能融会贯通史事，又敢于提出独到见解，对前人之注能择其所长而又不依违苟同，因而其《国语解》与杜预《左传注》足堪媲美，故一同为世所重。韦昭在《国语解叙》中，称誉《国语》作者“明识高远”，“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下迄鲁悼智伯之诛，邦国成败，嘉言善语，阴阳律吕，天时人事逆顺之数，以为《国语》”，“所以包罗天地，探测祸福，发起幽微，章表善恶者，昭然甚明，实与经艺并陈，非特诸子之伦也”。他高度评价《国语》的价值应与儒家经典并列，尤其概括“邦国成败，嘉言善语”八字，实则揭示出《国语》全书的记载重点和精华所在。韦昭不愧既有撰史的实践，又有过人的史识，所论切中肯綮。戴仔的评论，则见于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百零九“春秋四十二”所引：

吾读《国语》之书，盖知此编之中，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。而其辞宏深雅奥，读之味犹隽永。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，其文辞亦未易贬也。^②

戴仔之论，真能识人之所未识。他嘉许《国语》篇中所言“皆文、武之道也”，强调的即是《国语》总结邦国成败的史实和有关人物的评论，都深深符合治国的道理和成败的规律。此与韦昭总结的“所以包罗天地，探测祸福，发起幽微，章表善恶者，昭然甚明，实与经艺并陈，非特诸子之伦也”，二者正好异曲同工。韦、戴二人可谓目光如炬，所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，惜乎他们都仅是点到而已，未能畅加申论。今天我们的任务，就是以前人提供的启示为基础，深入地发掘《国语》中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，阐发其创设“记言”体史书的特色，总结它在历史叙事上的成功手法，对其在史学发展上的意义做出恰当评价。从而恢复这部古典名著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应有的地位。

① 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“《国语》，二十一篇。”所载篇数与今本《国语》卷数相同。

② 朱彝尊：《经义考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。

二、总结“邦国成败”，记载“嘉言善语”

《国语》首要的史学价值，是自觉继承《尚书》所开创的“殷鉴”传统，总结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。而且由于作者选取的历史事件之重要和阐发的历史经验之深刻，书中的记载已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极具教育意义的内容，千百年来脍炙人口，常常为人所称道，甚至作为箴言警句加以引用，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。书中总结的“邦国成败”历史经验，最为突出者可以举出以下两项。

一是记载西周晚期走向衰亡的必然性，深刻地说明统治者如果不对周围少数民族采取安抚的政策，不体恤民众的痛苦，就必然失败。

《周语》(上)着重记载西周晚期穆王、厉王、宣王、幽王时期关系政治成败的大事件。第一则，记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(周的卿士，周公之后)出来谏阻，曰：“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戢而时动，动则威，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是故周文公之《颂》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先王之于民也，懋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乡，以文修之，使务时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”^①祭公强调对待少数民族和对待民众，都要施行德政，让他们得到实利、增殖财富，通过修好政治、采取慈和温厚的措施，使他们向慕朝廷的恩惠，如果发生不按时祭祀贡享的失职行为，采用开导、说服的办法解决，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的拥戴。祭公的诤谏，是申述周公之教，务必做到敬德保民，先修政事而后刑罚，先礼而后兵。可是穆王却拒谏饰非：“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”^②周穆王不修德政、炫耀兵力的结果，是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！

继之，是记载周厉王监谤，最后失败被流放的著名故事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通过叙述明确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，认为像周厉王这样的暴君被流放是咎由自取，民众的举动是正义的。《国语》所载周厉王监谤，已成为最具鉴戒意义的典型史事，证明民众的意志才是决定最终成败的无比巨大的力量！其中总结的精警语句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”^③，在古代是

① 《国语·周语》(上)，第1—3页。本书所引《国语》原文，均据徐元诰撰，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：《国语集解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。

② 《国语·周语》(上)，第9页。

③ 《国语·周语》(上)，第11页。

真理，在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

《周语》(上)记载的其他几则关于西周晚期政治成败的史事，也都很有价值。周厉王听信贪聚财富、不顾民众利益的荣夷公，周大夫芮伯谏厉王不要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，否则，诸侯将不归附于周，说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！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。而或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，皆将取焉，胡可专也？所怒甚多，而不备大难，以是教王，王能久乎？夫王人者，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……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专利，犹谓之盗，王而行之，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，周必败！”厉王却一意孤行，任用荣夷公为卿士，实行专利，其结果，“诸侯不享，王流于彘”。又载，宣王即位，不籍千亩。虢文公谏曰：“不可。夫民之大事在农，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，事之供给于是乎在，和协辑睦于是乎兴，财用蕃殖于是乎始，敦庞纯固于是乎成。”据此，他批评宣王“不籍千亩”。古代帝王于每年春天举行籍田礼，既表示对农业的重视，又与军事训练和对民众的有效管理相联系，故虢文公又说：“王事惟农是务，无有求利于其官，以干农功。三时务农，而一时讲武，故征则有威，守则有财。”由此证明，“籍田于千亩”，不只是一种仪式，且是国家有效治理和习武加强防御力量的象征。虢文公谏行籍田礼，其归结点也是求福用民：“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，而弃其大功，匮神之祀而困民之财，将何以求福用民？”厉王废弃国事，籍田之礼已多时不实行，宣王继位，又不恢复籍田礼，果然招致失败：“三十九年，战于千亩，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”

二是记载齐桓公为何能够成功称霸。

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前期的重大事件，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两书均有记载，而重点、详略颇有不同，这是证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和作者关注的重点各异的证据，相比较之下，《国语》的记载更加连贯，颇有本末完具的特点，且做到重点突出；而《左传》则较为简略，对于齐桓公如何实现其功业的一些关键之处记载甚有欠缺。康有为曾认为，《左传》成书以后，作者“于是留其残剩，掇拾杂书，加以附益”^①而成《国语》。我们通过比较两书关于齐桓公霸业记载的异同，即可证明康有为之说不足凭信。

齐桓公之立为齐国君和任用管仲为相，有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。桓

① 康有为：《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》，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428页。

公是齐僖公之子、襄公之弟。僖公卒，襄公继位，他喜怒无常，公子小白惧大难将作，由齐大夫鲍叔护从，出奔莒。公子无知杀襄公而立，襄公另一位弟弟公子纠由管仲、召忽护从，出奔鲁。齐人杀公子无知，将迎公子纠回国。此时，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人为争取成功归国立为国君，正展开一场“智斗”。对于这一关键事件，《左传》记载甚为简略。对比之下，《国语》的记载却详细具体，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。《国语》所载，事件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，先写鲍叔如何大力称赞管仲的过人才能，再写桓公泯弃前仇的雅量，最后写齐国君臣巧妙用计，成功地从鲁国迎回管仲，桓公以格外隆重的礼节表示敬重。桓公与管仲原先是势不两立的仇家，后来桓公却委以相国重任，甚至称之为“仲父”，前后变化之大出人意料，通过《国语》的生动记载，读者才感到人物关系变化的自然、可信，并且从国君的器量和大臣的干才两个方面，体会到以后齐桓公能够实现赫赫霸业的深刻原因。

《国语》更重点地记载管仲富国强兵的措施和齐桓公实现“禁暴于诸侯”、“御戎狄，卫诸夏”的霸业。管仲向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策，包括：四民勿使杂处——处士就闲燕，处工就官府，处商就市井，处农就田野；制国以为二十一乡——工商之乡六，士乡十五，公帅五乡，国子帅五乡，高子帅五乡；实行富民政策，“遂滋民，与无财，而敬百姓”；实行相地而衰征，使赋敛合理，无夺民时；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——实行五家为轨，十轨为里，四里为连，十连为乡的制度；“春以蒐振旅，秋以狝治兵，是故卒伍整于里，军旅整于郊”。^①

大国霸政是春秋史上的大事，由于霸主主持，中原各国互相救援，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，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初年小国林立逐步走向统一的重要环节。《国语·齐语》着力对齐桓公征伐强暴、扶助弱小、扞御中原安定局面的功绩做了总括性叙述：“即位数年，东南多有淫乱者，莱、莒、徐夷、吴、越，一战帅服三十一国。遂南征伐楚，济汝，踰方城，望汶山，使贡丝于周而反，荆州诸侯莫不来服。遂北伐山戎，制令支，斩孤竹而南归，海滨诸侯莫不来服。与诸侯饰牲为载，以约誓于上下庶神，与诸侯戮力同心。西征，攘白狄之地，至于西河……西服流沙、西吴（同虞）。南城周，反胙于绛，岳滨诸侯莫不来服，而大朝诸侯于阳谷。兵车之属六，乘车之会三，诸侯甲

① 《国语·齐语》，第219—224页。